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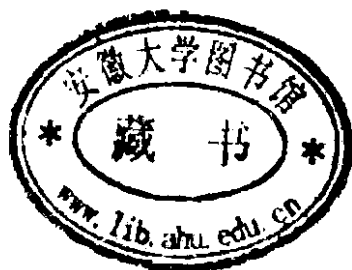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六辑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

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定铎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

编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上海绍兴路54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出版日期 1987年2月

YH244/28

编辑说明

一、为贯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关于文史资料工作向专题化系统化发展的方针,我们根据上海近现代历史的特点,继《旧上海的帮会》之后,编辑了这本《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专辑。

二、本辑所收文章,大部分是就本会历年积存旧稿加以整理,一部分是新近组织的稿件,另有少数文章曾在本会过去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上登载,经有关同志作了删改补充,重行发表。旧上海是外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工商界从事买办工作的人士也较多,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征集的稿件很不全面完整,希望知情人士积极写稿。对本辑内容遗漏讹误之处,欢迎补充订正。

三、本辑所收稿件,承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工作委员会大量提供,并帮助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日初同志在百忙中为我们撰写前言,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为本辑增色。在此一并致谢。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八月

前 言

——对外经济交往与近代中国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

丁 日 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将他们编辑的《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书稿送给我看，委托我写一篇前言，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外资企业与买办这两个问题的内容十分复杂，学者已经为之写了许多专著或长篇论文。这篇前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复已有论著的许多内容，只着重谈谈过去一直被忽视但很重要的几个问题，这就是：由洋行经手的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是否对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外国在华企业同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有无关系；买办究竟是怎样一种人物，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关系究竟如何，与此相联系，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究竟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一

鸦片战争以前，英美商人即对中国进行武装走私的鸦片贸易，战后在上海设立分行的一些老牌洋行继续热中于走私贩毒的活动，后来许多小洋行也都把走私贩毒作为主要业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同意外商将鸦片交税后在通商口岸销售，鸦

片的进口更不断增加,不少买办也争做毒品生意。与此同时,外国人还在中国从事拐骗华工、贩卖人口的活动,这种罪恶勾当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衰落了,但直到九十年代还没有绝迹。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指出,原始积累“在当代,以海盗船远征的形式继续下去,著名的反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一个例子”^①。贩运鸦片、掠卖苦力,这些都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海盗式贸易的重演。西方商人在中国,也是以本国的国家权力为后盾,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进行掠夺。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国的经济关系的一个特点,但它同时又是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市场的正常贸易的补充。没有鸦片走私,西方商人就没有资金购买中国的丝茶出口,合法的正常贸易就无法开展。

从鸦片贸易和掠卖苦力所获得的利润,一部分流回英美,成为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英美工业资本家由此得到了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大量资金,同时在中国的某些洋行也赖此产生并发展起来。“在十九世纪中叶,特别是一些老牌大洋行,在业务上从收取佣金为主转变成独立贩销的同时,开始发展船运、保险、贸易、船舶修造、银行等各种专业企业。”^② 这些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之一,就是鸦片贸易的利润。

买办来自运销鸦片的佣金收入,也是后来产生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买办曾经向外资企业,特别是轮船公司投资。七八十年代,买办和商人又向

①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13页。

② 聂宝璋:《十九世纪中叶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与暴力掠夺》。《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招商局大量投资，其来源一部分同他们从运销鸦片中所得的收益有关。中国的原始积累也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后来在条件具备时其中一部分转化为产业资本，用于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事业。同世界各国的历史一样，近代中国也只有经历充满苦难的原始积累，才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三十年，中国同西方的经济关系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八六九年十一月苏伊士运河通航，一八七一年海底电缆接通了伦敦同香港与上海。交通运输和通讯的便捷，导致交易周期缩短，经商所需要的经营资本也大为减少，使大批中小洋行有可能在中国开展业务，因而洋行在华势力进一步扩展。六十年代后期，英国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更新设备，改进技术，七十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高峰，使工业品成本下降，从而增强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在这样的情势下，鸦片以外的正常的进口贸易有了增长的条件，并终于超过鸦片而越来越居主要地位。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仍然大体上维持在一八七一年的水平上。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八八四年进口净值为七千二百七十六万一千海关两，一八八五年猛增至八千八百二十万海关两，一八八七年更达到一亿零二百二十六万四千海关两。以棉制品来说，它的进口值一八六八年为二千万海关两，一八八二年还不过二千二百七十万零七千海关两，一八八五年则猛增至三千一百四十九万四千海关两，进口值第一次超过了鸦片，一九一三年更增为一亿八千二百四十一万九千海关

两。其中，棉纱进口额的增长更为迅速，一八六八年为五万四千担，一八八二年增长到十八万五千担，一八八五年猛增至三十八万八千担，到一九一三年又增至二百六十八万五千担。它在进口商品中名列第三，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至十五。^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口贸易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以“杂货”为名的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食品、日用品和生产资料，其中有金属与矿物，渔产与海味，大米、小麦及面粉，食糖，卷烟、雪茄及烟草，染料、颜料及油漆，煤油，纸张，煤炭及焦炭，木材，机械及机器等等。九十年代初期这些杂货的进口，仅次于棉纱棉布，但已超过鸦片。据郑观应说，中国进口商品“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两”^②。

以新沙逊洋行为例，一八七二至一八八〇年，该洋行“以孟买为据点向远东发展，重点开发孟买和上海之间的贸易，主要业务是从印度输出鸦片、棉花和匹头之类的商品”^③。一八八〇至一九二〇年，“上海的新沙逊洋行仍以经营鸦片为主，但也进口一些印度自有纱厂生产的棉纱、棉布和麻袋等产品。至一九〇七年左右，后者的价值已与鸦片大致相等”^④。这家洋行成立以后的五十年间，主要经营的鸦片与棉制品，就是当时中国进口最多的两大商品，

① 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6 页。

③ 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 页。

④ 同上书，第 14 页。

同全国进口贸易发展趋势不同的是，早在一八八五年，全国棉制品的进口已经超过了鸦片，而这家老资格的鸦片商，迟到一九〇七年运销中国的棉制品才同鸦片大致相等。

关于经营“杂货”进口贸易的洋行，本书收了以下五家洋行或其买办的资料：（一）一八六九年在上海和宁波设立分行的法商永兴洋行；（二）创办于一八八四年的英商祥泰木行；（三）一九〇九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的英商宝威药行；（四）十九世纪下半期在上海设立分行的德商禅臣洋行的买办；（五）大约差不多时间设立的德商谦信洋行和一九二四年成立的德孚洋行买办周宗良。其中，永兴洋行原来只经营出口，到一九一七年前后才兼营进口，主要进口商品为矿水与红瓦，一九二一年扩大到呢绒、布匹、轮胎、香料等，一九三七年又扩大经营越南同得利白煤、药品、五金、钢铁材料、粮食（主要为大米）、建筑材料（主要有快干水泥）等。祥泰木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从美国进口洋松，其次从日本输入橡木、东洋松、麻栗木及南洋群岛的柳安木，并加工成材，或制作成件。宝威药行初期销售鱼肝油与雪花膏，后来制造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用药共有五百七十二种。禅臣洋行在二十世纪业务最发达的时候，经营的进口商品有机器、钢铁五金、电器、电缆、西药、香精、香料、颜料等。谦信和德孚洋行则专门经营德国的染料。

过去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对于外国同我国进行的正常进口贸易，往往笼统地贬斥为“商品侵略”或“商业侵略”，这种说法失之偏颇。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进口贸易确实有影响，但不能因此将正常的进口贸易也说成是“侵略”。正常的进口贸易同鸦片武装走私及掠卖苦力不一样，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依靠暴力来强制进行

的。当时中国虽然被动地卷入同外国的经济往来，但中国的国内市场对正当的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毕竟能够按照消费者的需要作出选择。以棉纺品来说，到一八六七年，“和战前的一八三八年比较，棉布进口略有上升，棉纱进口则反而减少了二十五万磅。也就是说，开放了五口，经历了三十年的光阴，外国棉纱、棉布的入侵基本上在原地徘徊”^①。同一时期，由于丝茶出口的大幅度增长，我国对外贸易是顺差的。马克思说，靠武力逼迫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影响”，鸦片贸易以外的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缺乏需要以及对于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乃是文明贸易在一切新市场上都会遇到的障碍”^②。中国人不需要进口的洋货，就可以迫使它们积压、跌价，甚至使掮客们濒于破产。鸦片战争后存在了二十多年的这种状况，不能单纯用中国遭受“商品侵略”来概括。

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的发展，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终究不能阻挡西方资本主义机制产品的推销。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进口贸易逐渐发生变化。一八七七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为逆差所取代。^③“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上半期（一八八一——一八八五），中国每年的出口额平均只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八十四，那么到了九十年代的上半期（一八九一——一八九五），这个数字更下降为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② 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9、168、170页。

③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1页。

百分之七十八。”^①一位学者就《马关条约》以前的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写道，当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商业性的，要求贸易平衡，进口主要靠出口抵偿，贸易逆差尚不太大”^②。这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冷静的论断。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增长引起了中国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也打击了手工棉纺织业以外的某些手工业部门。过去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这种破坏和打击也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方面的事实。前面讲过，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的进口贸易相对停滞就因为中国人民不愿意接受外国的纺织品，而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外国制造工艺改进，成本下降，产品物美价廉，逐渐受到中国消费者以及一部分生产者和中国近代企业家的欢迎。下面，举几种进口商品作为例证。

1. 棉纱。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一年间，“在国内手工织布业中，这种棉纱取代了用国产原棉以土法纺制的棉纱。机制棉纱不仅更匀称、更结实，而且在各方面都胜过土纱，它现在与土纱一样便宜，甚至比土纱更便宜”^③。“廉价的进口棉纱使过去从江南或湖北购买棉布或较贵的原棉的那些地区的手工织布业的经济有了可能。产量很低的那种手工纺纱业衰落了，而用进口纱制的经纱和本地纬纱织成的土布在四川等地区同纯手工纱织的布以及外国布匹竞争”；“机制经纱和手工纬纱结合起来使用，就制成了完全能与

①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100页。

②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265页。

③ 《中国对外贸易概要》。《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

外国布匹竞争的、甚至更好的棉布”。^①由此可见，进口棉纱虽然打击了土纱，却受到手工织布业的欢迎。

2. 洋布及其他棉制品。七十年代，“手织土布的售价较高，因而贫苦的中国人便不得不买便宜的但并不耐用的竞争品（指洋布——引用者）了”^②。到了八十年代，由于洋布“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③。九十年代，则“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④。至于其他棉制品，“如手帕、毛巾之类时新货物，在中国人中间日益流行，需求量迅速增加”^⑤。

3. 洋铁。洋铁比土铁便宜，而且“洋铁的形式便利，所以人们弃土铁而用洋铁。用洋铁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与劳力，因而洋铁产品的成本也就较土铁产品的成本低得多”^⑥，于是铁器制造业逐渐用洋铁来代替土铁。

4. 煤油。八十年代煤油价钱几为菜油的一半。煤油的发光力比豆油或菜油强。有一则资料说：“光绪以前，人燃灯，注豆油或菜油于盏，引以草心，光荧荧如豆。未几，有火油，灯明亮远胜油灯，……于是，上而搢绅之家，下至蓬户瓮牖，莫不采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⑦各式方便的煤油灯被广泛采用，煤油进

①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页。

②③④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2、224页。

⑤ 《中国对外贸易概要》。《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324页。

⑥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74页。

⑦ 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页。

口的数量就随着大为增长。“一八八七年，煤油进口量为一千二百万加仑，十年后即增至每年一亿加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加到每年两亿加仑。”^①煤油的进口虽然耗用了大量的中国外汇，但是煤油进口导致中国原来用于照明的植物油大量被用来出口。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植物油成为我国大宗出口商品之一，换回了大量外汇，而中国从这种交换中获得了“比较利益”的好处。

5. 粮食。我国虽然是农业国，但农业歉收年份，也需要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丰收年份，食品进口值仅数百万两；而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歉收年份里，进口值超过了一亿五千万关两，每年进口量达三千多万担，接近于国内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三。”^②同时，“中国内地各省叠床架屋的‘厘金’征收体系，使中国的大城市无法以比进口商品低的价格从本国遥远的省份获得农产品和原料”^③。而且，“从印度支那用海轮输入中国最重要的消费中心——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大米，其销售价格较之从四川、湖南、广西用大车和帆船运至上述地点的本国大米更为便宜”^④。因此，纵使是丰收年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也有从海外进口一部分粮食的需要。

6. 染料。随着国内机器织布业的发展，布匹的染色需要大量染料。我国化学工业落后，一九〇二年外国染料开始进口。先是德国和瑞士占据中国市场，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英美厂家亦将染料输来中国，以后法国、日本、意大利也参加竞销。^⑤显然，染料

①②③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22、38、35页。

④ 斯拉德科夫斯基著、郝藩封等译：《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第88页。

⑤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253页。

作为原料进口,对中国织布业的发展是大有帮助的。

7. 木材。中国一直是缺少森林资源的国家,只要商品经济发展,不论是在什么制度下,木材作为重要的工业材料进口,都是必要的,有利的。一九〇二年,外国木材开始输入我国,到二十年代,上海木材进口的数量逐年增加。上海的锯木厂和制盒厂多购买日本和西伯利亚的原木。“这些工厂过去都采用国产木材,近来由于内地盗匪横行,捐税繁重,货源极不稳定,价格又昂贵,它们发现用进口木材更加有利可图。”^①

8. 机械及机器。随着我国工业的兴起,我国现代企业需要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直到一八八六年为止,海关贸易统计中机械进口尚未分列专项。此后数年间,每年进口的机械价值估计近四十万关两。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后,中国开始热衷于兴办近代工厂,机械进口遂有增加。”^②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一年期内,“上海发展工业之后,机械、设备和原料的进口大大增加”^③。“一九一三年,国外进口的各种机器总值仅八百万关两,占该年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一点四;但到一九三六年,已增至三千八百五十万关两,占该年进口总值的百分之六点四。其中,来自英、日、美、德的纺织机械和电力设备名列前茅。”^④“中国的实业家们渴望获得最新工艺技术。这可从多数工厂采用国外机器设备一事得到佐证。上海海关曾对二百七十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在调查的二百七十家工厂中,一百四十六家有国外进口的机器,八家置有上海仿制的进口机器,七十七家兼有中外机器,只有三十九家工厂

①③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254、176页。

②④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22、39页。

仍用中国式的设备。”^① 这些资料有力地证明，从国外进口机器和原料是中国工业家所渴望的，这种进口贸易对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装备，而且也带来了技术转移。机器设备作为耐用的生产资料，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的工业发展起作用。

9. 其他商品。随着西方生活习惯影响的增大，某些食品和日用品逐步成为上层社会和高级知识分子乐于食用的商品。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一年的海关十年报告说：“从前列入免税清单的那些预定仅供外国人使用的商品，现在在数量上也有了很大的增长。长期以来，中国人可以随意购买这些商品。目前，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量已大大超过了外国居民。这类商品包括食品、酒类、雪茄、卷烟、面粉、肥皂和其他好几种物品。这表明中国人已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②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习惯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购买这些进口商品。

外国进口商品的大量增加，对中国产生了两种不利的后果。一、由于缺乏关税保护，中国贸易入超的数额越来越大，同时某些进出口商品的交换中也存在不等价交换的情况，这使外国资本家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润，使我国财富滚滚外流，造成我国货币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从而在这一方面妨碍我国工业化的正常进展。二、外国商品排挤了同类商品的中国土货，使千百万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更加困苦，或者破产失业，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我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对这种后果表示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近代中国，外国商品的进口既是不可避免的，又对中

①②·《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280、53页。

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某些有利的作用。(一)大部分进口商品是中国人所需要和喜用的,他们买来改善生活 and 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二)生产资料商品的进口,对我国的工业生产和民族经济有利。例如,早期棉纱的进口提高了土布的质量及其竞争力,后来染料的进口使我国织布业能生产出不褪色的美观的布匹。更为明显的是,在我国同类工业尚未兴起之前,机器设备、洋铁五金、木材、汽车等商品的进口,对我国的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与营运以及房屋建筑有利。(三)在长时期内,进口商品大部分由上海进口,上海和其他商业城市起着集散中心的作用,其中大部分不是本地消纳,而是由上海等地运至内地市场销售,因此,进口贸易既繁荣了上海经济,又带动了有关地区经济的发展。(四)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开拓了中国的广大市场,促使自然经济分解,自然经济的解体虽然是痛苦的,但又是必需的,同时漏卮的扩大必然促使爱国人士谋求抵制的办法。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本书就对此写了一段很有见地的话:“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吾为此言,人必谓我顽固守旧,对于陈腐之物质有认为国粹,亟思保存之意,实则非也。特惧自知拙劣而不能就原有者改进之,就未有者仿造之耳。”^①

我国棉纺、面粉、火柴、卷烟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行业,就是为

^①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十《杂记》,转引自《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专辑》,第343页。

了抵制洋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的进口商积累了相当的资本时就生产同一类产品。例如经营五金进口的商人用商业资本投资于生产五金的工厂，做西药进口生意的药房设厂制造西药，等等。这些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至理名言：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他们在中国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进口贸易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外国商人却起了促使中国逐步按照西方国家的榜样走向资本主义化这一符合世界历史前进趋势的作用。

三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的出口贸易。

鸦片战争以前，生丝和茶叶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战后直到一八七〇年，丝茶两项的出口值仍然占中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七，此后它们的比重不断下降，到一九一三年降至百分之三十四。以茶叶而论，一八八六年以前，在出口商品中始终高居首位，约占出口总值的半数弱。以后由于印度与锡兰茶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华茶地位逐渐下降。“一九二〇年已降到前所未有的最低水平，仅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一一点六，其绝对值则为一八七〇年前的四分之一左右。自那以后，茶叶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再也没有恢复它原有的地位。”^①

一八八七年起，丝与丝织品取代了茶叶的地位，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约占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弱。“由于缫丝工厂在中国的设立，丝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首要地位一直维持到本世纪二十

^①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268页。